

# 战时金融的困境与应对： 1942年“四行专业化”述论

尤云弟

**内容提要** 1942年前后，国统区金融面临着新困境。英美封存资金带来的金融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的军事转机和美国5亿美元贷款带来的信心，交织催生了应对金融困境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国民政府出台了四行专业化决策，以统一发钞权为关键举措，明确各国有银行的专业范围，提升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权，意图应对金融困境。四行专业化在金融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调整是成功的，然而囿于战局发展、金融领域的人事沟通不畅、监督制度不足和5亿美援错失良机，解决困境的实际成效不如预期。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借助四行专业化掌控四行，实现统制金融与军事、政治的紧密结合，透视出近代金融与政治、军事力量在实际利益层面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 四行专业化 抗日战争 金融 蒋介石 四联总处

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年份。此时中国金融已呈现疲惫不堪的困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为应对危机，1942年5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推出中国金融史上著名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下简称“中中交农”）四家国有银行专业化（以下简称“四行专业化”）的决策，意图帮助战时金融渡过困境。四行专业化决策的出台过程曲折复杂，实施影响拓展至金融、军事、政治等领域，绝不是简单的一纸公文即可施行。以往学术界的中国金融通史著作及相关银行史资料对四行专业化问题有所涉及和介绍，但叙述篇幅简略、结论相似。<sup>①</sup> 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且集中评述四行专业化如何达到扶植中央银行、监督金融的作用。<sup>②</sup> 可以说，已有成果既缺乏对1942年相关金融形势的深入分析，也没有对于国民政府决策过程的细致考证。譬如在太平洋战局变动和美国5亿美元贷款背景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四联总处、财政部如何出台四行专业化决策；中中

<sup>①</sup> 洪葭管分别在《中国金融通史》第4卷第7章第2节（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介绍了中央银行通过四联总处加强地位，金融垄断体系进一步扩大的经过；在《中国金融史》第6章第3节（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简述了中央银行地位的加强和中中交农四行信用扩张的情况；在《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下卷第14章第4节（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介绍了央行通过四联总处加强地位凌驾于其他三行之上的经过，但洪的研究皆只侧重四行业务划分和纸币由央行统一发行等事宜。

<sup>②</sup> 王红曼《对中国近代金融三次制度性创新分离之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认为四行专业化在金融制度、法律监管方面起到了扶植中央银行、监督金融的作用。结论似具启发，但对四行专业化的具体过程语焉不详。

交农四行(以下简称“四行”)在统一发钞权问题上如何博弈和达成妥协;四行专业化决策的最终成效及影响。这些都是本文着重探究的内容。

本文通过梳理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和杨格(Arthur Nichols Young)档案、哥伦比亚大学藏孔祥熙口述史料、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日记等中英文史料,追溯1942年前后中国金融困境之局,分析实行四行专业化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及其关键举措,并以蒋介石为中心,探讨国民政府的金融决策体制和关键人物如何一步步铺垫来应对困局,进而达到其统制金融,推展金融为政治、军事服务的意图,兼及分析四行专业化的成效和影响。

## 一、四行格局下的1942年前后金融困境

1939年10月,蒋介石推动改组四联总处,确立其最高金融机构的权力和地位。四联总处成为指导、监督、考核四行的领导机构。蒋介石本意由此出发统制金融,奠定整个战时金融财政的基础<sup>①</sup>,但实际情况没有因为四联总处的设立而得到全面改善。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以下简称“央行”)总裁孔祥熙给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绝密报告,指出1939—1940年份财政收不抵支状况日益严重,除了增税、发公债外,国库支出主要靠银行垫款,超发钞票,甚至利用银行存款,吸收游资。由于“现在战事延长,财政与军事前途关系益切”,孔祥熙决定把“真实内容尽情披露”给蒋。<sup>②</sup>与此同时,蒋在日记中也忧心忡忡地提到“金融外汇势甚危急,物价飞涨,经济已入险境”。<sup>③</sup>抗战进入持久阶段以来,国民政府所剩无几的财政库存被消耗殆尽。

随着英美封存资金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和香港两大金融中心受到冲击,金融经济情况愈加复杂。在此之前,1940年7月日本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同月,英国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东南和西南地区运输线均被切断,国外币钞内运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1941年三四月份,四联总处、四行负责人以及孔祥熙皆在商议国外币钞经香港或缅甸尽快内运,不得滞留,紧急时刻上海四行撤到美军租界防区内营业。一旦租界当局不提供切实保障,即当停业撤退。<sup>④</sup>7月,日本军队占领越南军事基地及飞机场后,英美两国的远东利益受到威胁。英美政府即宣布封存中国和日本在英美资金,防止资金外流。四联总处副秘书长徐柏园认为此事给中国带来“金融上划时代之变化”。<sup>⑤</sup>随后徐柏园呈文蒋介石,提出掌控战时金融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把握金融主动权和按照国内外局势因时制宜,并提出应着重在“调节通货发行,以免过度膨胀”,“节制公司金融机关之放款投资业务,充分发挥金融力量”,“管理外汇”,“划一金融行政并加强管理金融市场”<sup>⑥</sup>四个方面来掌控金融。这就抓住了当时战时金融困境的关键问题。徐柏园提出的两大原则和四个方面都被

① 尤云第:《四联总处的创建及初期运作——以蒋介石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8期,第79页。

② 《最近财政实况》(1939年6月),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439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5月3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④ 《四联总处关于上海金融机关撤退及国外币钞内运各项办法密代电》(1941年3月25日),《四联总处关于港沪四行之措施节略》(1941年3月),《中央银行报告沪港两行部署撤退情形函》(1941年4月4日),《孔祥熙指示上海四行应变措施密电》(1941年4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14页。

⑤ 《徐柏园就封存资金后之金融方针给蒋介石的呈》(1940年9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⑥ 《徐柏园就封存资金后之金融方针给蒋介石的呈》(1940年9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280页。

蒋介石所采纳,体现在嗣后的四行专业化决策过程中。英美封存资金后四个月后即1941年11月15日,美军决定短期内从上海撤退。<sup>①</sup> 港沪金融中心均为法币流通区域,有国民政府力图维系的外汇市场。而且抗战后方和沦陷区所需的国外物资常常要转经港沪而输入内地。一旦美军撤退,上海四行处境更加困难,港沪金融中心将失去保障。而随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打破了内地对港沪依存关系的平衡点,给金融、经济带来重大冲击。

至此,上述金融与军事战局变动交织促成了金融困境,经济大受影响。蒋介石甚至评价1941年底中国经济“俨如一染有第三期肺病之病人”。<sup>②</sup> 作为战时金融主导力量的中中交农四行,在徐柏园所提议应当注重的控制通货、投资运用、管理外汇、统制金融行政四个方面表现皆不如人意。整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首先在控制通货方面。控制通货的理由来自市面物价疯涨、法币贬值、银行滥发货币的连锁反应。1940年中国遭受严重歉收,甘肃、陕西、河南三省因受春旱夏涝的影响,收成仅为十足年份的五成左右,其他省份的夏季作物收成也仅约为七成左右。<sup>③</sup> 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运输路线阻断,物资外运和内运皆有困难,“故外销货物势须看跌,内运商品将见暴涨”,“涨风之烈实足惊人”。<sup>④</sup> 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关注物价,非常担忧物价暴涨带来的危险,表示“法币之价更贬,物价暴涨,而财政部统制金融无策,竟使高利贷放囤积之风更炽,此为本年最恶劣亦最危险之一事”。<sup>⑤</sup> 以重庆为例,当地产品、来自外省商品和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从1939年6月到1941年12月,皆增长10多倍。假设1939年6月整个中国后方的商品物价指数为100,到1940年12月指数已达到391,到1941年12月指数则已高达1029<sup>⑥</sup>,百姓生活成本剧增。

由于战时政府收入停滞,开支逐年膨胀,财政赤字有增不减。为满足政府的巨额开支,政府指示银行滥发货币<sup>⑦</sup>,致使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需求量。但是,新钞票的发行额远不能满足政府所需,四行不得不增加给政府的垫款。1940年国有银行钞票发行增加额达到35.8亿元法币,对政府垫款额为38.31亿元。1941年钞票发行增加额达到72.3亿元法币,对政府垫款额为94.43亿元。<sup>⑧</sup> 尽管银行鼓动存款业务,吸收游资,但四行的存款储蓄远跟不上银行对政府的巨额垫款。如1941年四行普通存款和储蓄存款的总额104.64亿元,给政府垫款额达94.43亿元,比例高达90.24%。<sup>⑨</sup> 为应对有增不减的货币需求,早在1939年3月央行决定“另账登记”,增加发行,四联

① 《四行驻港总处致四联总处电》(1941年11月20日),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645页。

②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财部代表柯克朗指陈中国经济危机之严重性嘱其回美后转陈政府务使美国对华经济援助能有一整个的、固定的具体方案谈话纪录》(1941年11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22页。

③ 《中央农业实验所对1940年夏季作物产量估计》(1940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8),第262页。

④ 《行政院抄发经济会议秘书处关于美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重要经济事项提案训令》(1941年1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216—217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反省录”。

⑥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 - 1950* (New York: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8), p. 36.

⑦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 - 1950*, p. 38.

⑧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 - 1950*, p. 40.

⑨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统计月报》(1947年11、12月第123、124号),台北,“国史馆”藏,财政部档案,018/000034/282A。注:储蓄存款包括普通储蓄、节建储蓄、乡镇公益储蓄,乡镇公益造产基金储蓄、外币储蓄、有奖储蓄、黄金储蓄、美金储蓄等。原表由财政部统计处根据四联总处之材料编制。中央银行在1942年之前没有储蓄存款。

总处、财政部、央行、中国农民银行(以下简称“农行”)均参与其中。<sup>①</sup> 1940年11月,央行发行局呈报相继发行大额交通银行(以下简称“交行”)25元钞券和农行50元钞券。同时各行纷纷向英美等印刷厂增印钞券,如央行续向中华书局订印1亿元钞卷,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赶印钞券5亿元,交行也有参与。<sup>②</sup> 如果一味增发货币,物资生产没有跟进,那么经济会陷入物价疯涨的恶性循环,通货信用荡然无存。

蒋介石曾试图控制通货。1940年9月,蒋介石发手令要求严加限制四行50元和100元大券发行数额,“务使大券不致常在市面流通,以免往年德国马克与俄国罗卜(一般译作卢布——引者注)逐日加圈,恶性膨胀之危殆”。<sup>③</sup> 1941年4月15日,蒋介石再次发手令要求封存赣湘川黔地区2亿元法币。<sup>④</sup> 19日,蒋介石加批6000万元,共封存2.6亿元法币。<sup>⑤</sup> 旋至当年六七月,因为四行库存短绌,奉蒋介石手令封存的2.6亿元钞券陆续解封提回应用。<sup>⑥</sup> 蒋介石意识到银行巨额发钞量和物价疯涨折射出来的恶性通胀已接近不可收拾的临界点。1942年3月中旬,蒋介石手令要求四联总处加强对四行的统制,特别注重“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声称“此为最急之要务,须限期完成”。<sup>⑦</sup> 统一发行,控制通货,势在必行。

其次是投资方面。1939—1941年间的工业内迁给抗战后方带来了初具规模的国防建设基础,同时给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西南地区带来经济建设新气象。发展工业必然需要大量资金。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即下令要沿海各工厂内迁。由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完成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迁移。从上海迁出民营工厂共146家,机料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sup>⑧</sup>,给湖南、福建、浙江、湖北等地提供了内迁经验。尽管四联总处协调四行为农工矿业提供贷款,但四行业务分工不明、资金不集中、贷款不足的问题仍影响着农工矿业的发展。如交行本来专门办理工贷贴放,现在由四行联合分担办理;中交两行暨中央信托局都着手农贷。而交行作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生产实业投资放款非常不足。1939年底交行存款已达13.7亿元,但生产事业放款仅430余万元,农工矿产品押款570余万元。<sup>⑨</sup> 随着战局的扩大,农工矿建设资金需求越来越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也造成四行下拨的贷款额不敷其用。显然,四行需要划分投资和放款业务范围,加大投资,以便促进经济建设。

第三是外汇管理方面。中国实行外汇汇兑本位。法币的稳定性与外汇汇率息息相关。<sup>⑩</sup> 政府为维持币信,急需统筹外汇收付。抗战以来,尽管中国物价涨势汹汹,但官方外汇汇率一直保持平稳。1939年6月到1941年12月间央行公布的外汇汇率平稳保持在1美元兑换20法币的比率。<sup>⑪</sup> 中英平

①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增加发行、“另账登记”》(1939年3月28日),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383页。

② 《常务理事会第1926次会议》(1940年11月27日),《常理会2101次会议记录》(1940年6月1日),《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致陈行函》(1940年7月20日),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598—601页。

③ 《蒋介石关于发行大券及省行发行辅币问题手令及孔祥熙签呈稿》(1940年9月—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45页。

④ 《蒋介石致徐堪、徐柏园函》(1941年4月15日),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下卷,第818页。

⑤ 《徐堪、徐柏园致蒋介石签呈》(1941年4月19日),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下卷,第818页。

⑥ 《封存钞券数:解封钞券数及其余数简表》,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下卷,第823页。

⑦ 《四联总处1942年度重要工作报告目录》(1943年),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下卷,第781页。

⑧ 《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1943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6),第319页。

⑨ 《徐堪等为附陈所拟四行1939年度业务之比较呈》(1940年3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4),第7页。

⑩ 吴景平:《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9页。

⑪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p. 41.

准基金、乙种中英平准基金和1941年4月的中英美平准基金一直靠向市场抛售大量外汇来维持汇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商贸活动被阻断,政府认为民间合理的外汇需求已大大减少,相应的外汇审核和供应量锐减,决定不再通过售汇来平抑法币汇价,反而要掌控外汇。政府外汇收入主要靠出口贸易和侨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口贸易基本停滞,南洋一带侨汇因交通阻塞暂时停顿。鉴于法币恶性贬值、官方牌价和黑市汇率的巨大差别,央行和财政部担心外汇包括侨汇流入“地下”交易,届时无法掌控外汇包括侨汇的流向。国民政府亟须要由央行集中筹划外汇包括侨汇收付,防止资金外流。

第四是统制金融行政方面。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一职掌控四行,按理通过四联总处可对四行体制、机构、职能、人事等加以直接督导,统制金融行政并集中力量推行战时金融政策。然而随着四联总处的运作,四行之间未能充分沟通和合作来执行战时金融政策和四联总处的决议案件。四联总处秘书长徐堪等人指出,央行本应该推广贴现及重贴现业务,来调剂金融,但1938年央行承做贴现与重贴现仅390余万元;中行在存款总额、储蓄存款业务首屈一指,实力雄厚,但其作为国际汇兑银行,对于协助政府调度国际收支,尚未发挥功能;交行作为发展全国实业银行,显然生产实业投资放款数额过少;至于农行,1939年度业务进展太少。<sup>①</sup>1940年9月,央行甚至抱怨中行、交行、农行三行(以下简称“中交农三行”)“对于总处决议、案件未尝尽力推行,或竟违反总处决定之原则及办法,为其本身暂时便利标奇立异,自乱步骤者殊属不合”。<sup>②</sup>显然,四行肩负调度金融的重任,本应该统一金融行政并管理金融市场,但实际未能统一。实行四行业务专业化,督导国家行局(包括四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加强四联总处管理金融市场方面的权限,迫在眉睫。

总之,1942年前后的中国金融在控制通货、运用投资、管理外汇和统制金融行政等方面,表现不容乐观。其中控制通货与法币发行息息相关;投资问题与划分银行业务挂钩;统筹外汇关系到币信;统制金融行政与督导国家行局、管理金融市场有关。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曾评价“法币是稳定、统一的象征,也是维持对华信心的来源”,倘若“货币崩溃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生活成本提高会引起暴乱,政府的威信将会严重损害,民族士气将会被动摇……进一步破坏到经济体制”,甚至难以得到外援。<sup>③</sup>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欲争取大额美援来挽救战时金融财政,获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倘若此时金融崩溃,对中国而言,肯定是难以挽救的危机。再加上英美封存资金带来的金融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的军事转机,这些都促成了出台四行专业化决策的迫切性。因此,国民政府亟须借助实施新决策来应对战时金融困境,并且首先要从重新厘定四大国有银行的地位尤其是央行和其他三行的关系入手。

## 二、四行专业化决策的出台

1942年5月,国民政府为应对战时金融困境,在国内既有的金融制度和四行格局的基础上,借助1942年3月美国5亿美元财政援助带来的信心,出台了金融财政领域的一项历史性决策——四行专业化。内容包括央行统一发钞权、四行经营业务划分、央行统筹外汇、央行集中存放头寸等多方面。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在四行专业化决策的酝酿与出台过程中,亲自策划和推动实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sup>①</sup> 《徐堪等为附陈所拟四行1939年度业务之比较呈》(1940年3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4),第4—8页。

<sup>②</sup> 《央行致各分行处通函》(1940年9月26日),洪菱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下卷,第805页。

<sup>③</sup> Memorandum on the Currency Situation, January 3, 1938,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Arthur N. Young Collection, Box 69, Folder Currency June-December 1940.

论及国民政府加强四行专业化和提升央行地位及职权的想法,要追溯至抗战前中央储备银行的筹备。<sup>①</sup> 1937年6月,立法院曾批准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储备银行的详细方案,欲使央行脱离政府支配,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以便控制金融市场,旋即因七七事变发生,中央储备银行的方案不得不搁置。<sup>②</sup> 直至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宣布中中交农四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即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sup>③</sup> 四行以分担责任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分摊承做贴放、投资、储蓄、发行、汇兑等业务。时人评价此乃“我中央金融机构,至此乃奠定真正集权管制之基础”。<sup>④</sup> 但四行各自为政现象仍然日益严重,蒋介石感到亟须加强“统制”四行并使其业务范围“专业化”。1940年3月,蒋亲自主持四联总处全体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指示“拟定一个三年计划决定四行业务方针及各行业务发展的方向,来逐步发展经济增加生产,安定金融以奠定国家经济基础”。<sup>⑤</sup> 蒋认为此事“关于经济金融之前途成败甚大也”。<sup>⑥</sup> 蒋介石公开把四行业务专业化问题与国民经济金融前途挂钩,并态度明确,主动积极。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把握这个国际局势变动时机,将调整金融机构列为其1942年大事件处理。在此之前,除西北方面之外的国际运输线已遭阻断。蒋介石日夜盼望,日本能够南进或北进,引起苏联或者美国参战,打破这个军事僵局。突然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对日宣战。蒋介石甚为欣喜,认为“此为抗战四年半以来,最大之效果,亦惟一之目的也”。<sup>⑦</sup> 并嘱咐下属“须把握住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来审慎运用我们抗战所已得的地位与力量”。<sup>⑧</sup> 蒋介石此时非常关切国内经济金融情势,开始研究四行统一计划<sup>⑨</sup>,把“统一四大银行与加强四联总处组织”列入1942年大事表<sup>⑩</sup>,决意掌控金融为抗战服务。

此后,蒋介石一直忙于策划四行专业化的具体方案,主动与孔祥熙、财政部、四联总处及四行主管人员等商量,多次交办手令以贯彻自己的统制金融思想。1942年1月23日,蒋介石预定本星期事项有“四行统制与全国金融之统制方案”。<sup>⑪</sup> 1942年3月中旬,蒋介石研究四联总处改组计划和统制四行实施办法。<sup>⑫</sup> 这些表明蒋介石决心要统一四行,并考虑四联总处的工作调整。<sup>⑬</sup> 1942年3月22日,蒋介石交办孔祥熙手令,希望“以后对于中中交农四行应加强统制”,特别指出其中七部分:“(一)四行人员之考核调用与统制;(二)限制四行发行钞票改由中央统一发行;(三)统一四行

① 1935年11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宣称国民政府筹划将中央银行改制成中央储备银行(Central Reserve Bank),保管各银行的法定准备金。中央储备银行将是一个独立机构,来保障银行体系的储备和国家货币的稳定,且不参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两年后将享有唯一的货币发行权。参见 Frank M. 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ublic Relations, 1942), p. 219.

② Arthur Nichols Young,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 - 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pp. 273 - 276.

③ 《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1939年9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67页。

④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第2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⑤ 《四联总处全体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0年3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四联总处会议录》(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324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3月28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⑧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608页。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20日。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大事表”。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23日。

⑫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13日、3月17日。

⑬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9),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163页。

外汇之管理；(四)考核并规定四行之业务；(五)从新检讨并审核四行之预算；(六)稽核四行国外之存款与国内之放款，并饬其按月呈报；(七)四行人薪给奖惩以及预算与各种业务皆须编订法规与细则，俾各银行皆能一律遵行，此为最急之要务，须限期完成为要”。<sup>①</sup>可以说，蒋介石对于四行的统制从业务划分到法规细则制订，都做了全盘的细致考虑。

1942年3月末，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统一金融与调整四联总处方案”，认为这是四行统一的根本解决办法。<sup>②</sup>4月中旬，孔祥熙上报蒋介石已由财政部会同四联总处及四行主管人员详商各项办法草案，由财政部分别订定办法实行各省省银行以及商业银行业务的考核。并提出调查各地金融市场时，应该由财政部和央行合作办理，才能切实收效<sup>③</sup>，希望提高央行地位，与财政部合作控制金融市场。4月下旬，蒋介石批准了四联总处提出的四行统一方案与四联总处工作方针。<sup>④</sup>5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预定的本星期事项之一是“四联总处改组之实施”。<sup>⑤</sup>此时国民政府亦对外宣称，四联总处研究出中中交农四行专业化的实践方案，可使央行实现“银行之银行”的理想。<sup>⑥</sup>

根据四联总处奉蒋介石手令拟具的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1942年5月28日上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议。<sup>⑦</sup>会议讨论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统一发行办法》、《统一四行外汇管理办法》、《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等条款<sup>⑧</sup>，对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实行专业化分类管理：

(1)中央银行集中钞券发行，统筹外汇收付，代理国库，汇解军政款项、政府机关以预算作抵或特准的贷款，调剂金融市场；(2)中国银行受中央银行委托，经理政府国外款项的收付，发展与扶助国际贸易，并办理有关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受中央银行委托，经办进出口外汇及侨汇业务，办理国内商业汇款，办理储蓄信托业务；(3)交通银行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办理国内工商业汇款、公司债及公司股票的经募或承受，办理仓库及运输事业，办理储蓄信托业务；(4)中国农民银行办理农业生产贷款与投资，办理土地金融业务，办理合作事业的放款，办理农业仓库信托及农业保险业务，吸收储蓄存款。<sup>⑨</sup>

除央行外，中中交农三行对于存款、储蓄、一般放款等业务，仍照常办理。“所谓业务划分，实在是强调业务重点，如要彻底划分，是不可能的”。<sup>⑩</sup>至此，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及银行专业化体系确立。蒋介石评价道“四大银行之发行权完全归中央银行统一，四行各种规章皆能改正实施，此为经济上开国以来最大之进步”。<sup>⑪</sup>随后四联总处于1942年9月实施第二次改组，职责发生显著变化，主要是监督指导国家行局的业务；协助财政部管理其他金融事宜。蒋介石在理事

① 《令孔副院长加强四行之统制》(1942年3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65/001/041x。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27日、4月2日。

③ 《孔祥熙答复呈文》(1942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65/001/041x。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4月21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5月9日。

⑥ 《国家银行专业化》，天津《大公报》第148册，1942年5月11日，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563页。

⑦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9)，第493页。

⑧ 《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会议纪录》(1942年5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四联总处会议录》(15)，第1—22页。

⑨ 《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1942年5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61—562页。

⑩ 徐柏园：《蒋总统与四联总处》，中华学术院编：《蒋总统八十晋九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413页。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总反省录”。

会增设副主席一职,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兼任,处理四联总处事务。四行专业化和发钞权统一后,央行实力增强,基本具备“银行之银行”功能。国民政府更多依靠央行来管理金融事宜。四联总处的权责范围虽然有所减少,但在战时金融经济领域仍有着重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5亿美元财政援助合同的签订,也是国民政府出台四行专业化决策的契机之一。这是抗战时期中国从美国获得的数额最大、条件最优惠的一笔贷款,给国民政府应对金融困境带来了更多信心。蒋介石对这笔贷款的达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蒋在贷款原则上态度强硬,国民政府掌握了这笔贷款使用权的主动权。

虽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在军事领域给予中国诸多帮助,但战争的胜利不仅仅靠军事,还有经济因素。<sup>①</sup> 杨格曾指出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截止1941年10月四行已发行133亿元法币,中国的货币和经济日益严峻,急需大量美援来巩固币信,平衡战时收支,安定金融和稳定经济。<sup>②</sup> 早在1940年6月,蒋介石派宋子文去美国游说贷款事宜,来维持财政金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被委任为外交部部长,继续在美国寻求美援。此时美国朝野均主张加强援华,以保证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故中国得到美援来控制币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蒋介石指示孔祥熙、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沟通的时候,强调美元贷款用途为紧缩货币,纾缓通胀。1942年1月,孔祥熙为商借5亿美元,致信摩根索,表明5亿美元援助目的是巩固币信、吸收游资、平抑物价及适应其他抗战军事之用。<sup>③</sup> 1942年2月4日,蒋介石函电孔祥熙,指示“大借款运用之方,第一以收缩法币为要”。<sup>④</sup> 同时,蒋嘱咐宋子文在跟摩根索谈判时,要求美国不能限定任何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方法,可以基于友谊笼统地告诉用途。<sup>⑤</sup> 2月7日,罗斯福总统电告蒋介石5亿美金贷款法案在两院通过。<sup>⑥</sup> 3月21日,宋子文与摩根索正式签订中美5亿美元财政援助合同,该合同未对贷款利息、担保、期限等做出限定,对贷款用途仅作原则性说明。那么具体如何使用这笔贷款,成为当时国内外人士议论的主要话题。平准基金会美国委员福克斯(A. Manual Fox)曾建议贷款用于“发行政府公债以吸收法币,缓和通货膨胀;发展与印、俄的贸易,保证进口的持续;如果可能,贷款可用于促进急需的小型工业及农业生产,以提供除钞票发行之外的外汇基金”。<sup>⑦</sup> 孔祥熙认为5亿美元是“美方给的钱”,打算购买黄金并出售给百姓来吸收游资,建立币信<sup>⑧</sup>;此外发行美金胜利公债来巩固币信。<sup>⑨</sup>

这笔数目可观的5亿美元贷款增强了蒋介石出台四行专业化决策来实践统一发钞权、建立货币信用、稳定金融的信心,增加了四行专业化决策出台的可能性。一方面四行业务范围调整后,各行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投放经济建设,若能将部分美援用于投资建设,对改善和稳定战时中国财政金融的情势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央行统一发钞权后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作为发行准备金来控制市面流通的钞券量,保证币信。如果能成功利用部分美援从美国购买黄金,在国内抛售和发

① 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61页。

② United States Aid for China, Chungking, December 3,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Arthur N. Young Collection, Box 69, Folder USMYM500 Million Loan, May 1942.

③ 《孔祥熙为商借美国五亿美元借款致摩根索函》(1942年1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2),第772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2月4日。

⑤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8),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228页。

⑥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8),第242页。

⑦ *Morgenthau Diary (China)*, Volume 1,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 p. 563.

⑧ No. 1 Kung Hsiang-Hsi, p. 133,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Box 18.

⑨ Chinese Currency Stabilization, March 24, 1942, National Archives II of USA, Maryland, RG56, Entry66A816, Box68, Folder China Loan (MYM500 Million) January 1942.

行美金公债与储蓄券回笼法币,吸收市面上的游资,正好可以减少通货膨胀的危险。因此,蒋介石十分满意,高度评价“美国五万万金元之大借款完成,使我财政危而复安”。<sup>①</sup>

四行专业化决策,明确了四行业务范围,中央银行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中国银行改为发展国际贸易银行,交通银行发展为全国实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为发展农村经济暨协助实现土地政策银行<sup>②</sup>,合作负担调剂全国金融和扶助农工矿交商各业生产建设的责任。随后通过四联总处改组,加强四联总处督导国家行局职能,整个过程涉及控制通货、运用投资、管理外汇、统制金融行政等多方面。国民政府最高决策人蒋介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最关键的。他在既有的国内金融制度和四大银行格局的基础上,借助美国5亿美元援助带来的信心和契机,把四行专业化付诸实践。

### 三、围绕统一发钞权的四行博弈较量

1942年四行专业化的关键性决策在于统一发钞权。蒋介石曾评价“四大银行法币发行由中央统一与管制四行业务之实施,是经济政策最大之进步也”<sup>③</sup>,足见其对统一发钞权的重视。一直以来,确立央行超然地位、实现统一发行被国民政府视为金融改革的中心。对于其他银行来说,其余举措是在制度层面调整各行经营业务或归于央行委托管理,唯独“集中发钞权于央行”是取消了中行、交行、农行三行的具有巨额利润空间的职权。如何统一发钞权于央行,取消其他三行发钞权是四行之间一场艰难的利益博弈。蒋介石、孔祥熙、徐柏园和四联总处、财政部、央行三家机构的相关负责人等皆参与商讨政策细则。经过一番较量和妥协,中交农三行交出了发钞权。

首先简要梳理下统一发钞权前的四行发钞情况。1935年法币改革时,财政部曾表示拟改组央行为中央储备银行,独享发行权。虽然央行发行准备十足,但是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中行和交行压制了历史短暂的央行的发钞。不少银行拒收央行钞票。最终国民政府以财政部布告的形式,宣布央行、中行、交行三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后来又规定农行发行的钞票视同法币,禁止一般银行发行钞票。将发钞权从分散于数十家银行初步集中至四家国有银行。尽管如此,币制改革后的两年内,央行统一发钞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极小。中交两行在发钞总数中所占份额没有减少,农行发钞量竟然增加了将近7倍。广东、河北、湖南、山西、江苏、广西等省银行所发钞票量也在增加。1935年11月2日至1937年6月30日,央行发钞量占四行发行总额,仅由18%增加到20%。<sup>④</sup>抗战爆发后,四行继续滥发钞票,引起金融和经济的一系列恶果。财政部钱币司对于货币管理问题,曾撰稿称法币币信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推行其他战时金融政策<sup>⑤</sup>,强调币信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在战时金融情境下,由央行统一发钞权更为迫切。

负责应对金融局面的四联总处开始着手研究统一发行事宜。四联总处副秘书长徐柏园、央行发行局局长李骏耀奉蒋介石令,详加商讨统一发行应行准备事项,决定:定于7月1日央行实施集中发行,并修改组织规程应对储运券料、兑换钞券、保存公债、收付发行准备等各种事宜。考虑战时沦陷区金融早已自成体系,各地金融情形不尽相同,况且央行的“银行之银行”职能尚未充分发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总反省录”。

② 财政部直接税处编:《十年来之金融》,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第12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6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④ 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pp. 486-497.

⑤ 《财政部钱币司撰抗战三年来之货币管理稿》(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4),第477页。

所以最好能沿袭现有中央银行,集中一家发行,健全银行制度。<sup>①</sup>

与此同时,四联总处、财政部和央行会商,拟具《统一发行办法草案》六条,于1942年5月28日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议修改通过。之后邀集四行主管发行人员及财政部先后举行四次特种小组会议,商讨详细实施办法。<sup>②</sup>中交农三行以“其使命其地位以及与国家民族经济金融之关系俱极密切而重大”,请求放宽缴交发行准备金期限<sup>③</sup>,并且对于统一发行后中交农三行业务所需资金的供应问题及移交准备金期限问题提出疑虑。中交农三行希望有优待条件和详细规定,以期获得保障。在6月10日的特种小组会议上,中交农三行提出如因办理四联总处核定贷款,或业务贷款及支付存款,需要资金,可由三行以下列方式申请央行接济资金:重贴现、同业拆放、财政部垫款户划抵、以四联总处核定贷款转作押款,其利率可照原收利率减低2厘至4厘。但央行以蒋介石命令即行接收的指示为由,表示全部反对。<sup>④</sup>

中交农三行顾虑到统一发行后央行可能无法充分供应资金,想以推迟交出发行准备金作为过渡。在多次协商后,四行对于央行供应资金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但发行准备金缴交的期限没有推迟。1942年6月13日,中交农三行负责人联名呈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及四联总处,申请改分五年平均摊交发行准备金,理由是:1. 抗战以来,三行的政府垫款都已超过发行数,如将发行准备金一次全部交出,而贷款又不可能立即收回,支付存款就有困难;2. 中交两行都有历年政府拖欠和军阀借支未能收回情况,还有战争损失,战时各项开支激增,如准备金立即补齐移交,将无法应付业务需要;3. 今后发行统一,中交两行不再代理国库,以前的往来客户会因此大量减少,存款难期增加,与贷款需求很难适应。但是,分五年平均摊交的办法,显然与迅速壮大央行实力、统制金融力量的初衷不符,自然不能为蒋、孔所接受。经过多次协商,最终确定由央行采取重贴现、同业拆放、财政部垫款户划抵以及以四联总处核定的贷款转作押款等四项办法从优供应三行资金,发行准备金的移交则仍维持原案,限于1942年7月底以前办妥。<sup>⑤</sup>6月16日举行第四次特种小组会议上,四行对发行准备金缴交期限不再提出异议,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行准备金缴交后的弥补办法。

6月18日,四联总处第130次理事会修正通过《统一发行办法》和《统一发行实施办法》,对中交农三行已发、未发及订印未交的各种钞券制定了详细的处理方案,对与钞券有关的人员、库房设备、运钞车辆及所存油料等进行核查。这两项“办法”规定中交农三行须把已发法币总额、各地发行库存,及订制未交券各项数额于6月底决算日结出,于7月底以前,造具详细表单,送交财政部、四联总处及央行各一份备查。已发各种钞券仍照旧流通,发库所存钞券,无论存于总行或各地分行处者,均应移交央行接收或出具寄存证,交央行收执。订制未交钞券,自1942年7月1日后,无论续交或在运送中,概由央行提收。所有中交农三行的印券合约,均移归央行承接,其已付定金及印费扣缴的单子,另行各别商定。……中交农三行移交准备金除以交存于央行的白银抵充外,其余应尽先以国库垫款拨充。中交农三行6月30日止所发法币准备金,限于7月31日以前全数移交央行接收,并由央行贴还40%的保证准备利益,按周息5厘计算,以三年为期,自1942年7月1日起至1945年6月30日止,每半年结算一次。<sup>⑥</sup>

① 《常理会2593次会议》(1942年6月26日),洪履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630页。

② 《理事会关于统一发行实施办法的决议》(1942年6月1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中,第37页。

③ 《中交农三行关于移交发行准备宜酌宽时日的意见》(1942年6月1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中,第41—42页。

④ 四联总处秘书处编:《四联总处重要文献汇编》,台北,学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47—48页。

⑤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79页。

⑥ 《理事会关于统一发行实施办法的决议》(1942年6月1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中,第37—41页。

这些资金往来,每月底制表汇报财政部及四联总处备查。中交农三行应将各地办理发行人员姓名、简历,各地库房设备及容量,运钞车辆及所存油料,送请四联总处及央行备查。经四联总处理事会议核准后施行,并报请财政部备案。<sup>①</sup>

1942年7月,中交农三行继续与财政部洽商发行准备金原则,达成三项原则,即:白银部分应按照原价计算;中交农三行以财政部所还的垫款来缴交现金准备;中交农三行可以向财政部结购公债抵充应缴的四成保证准备金。财政部相应制订了详细的四项办法:中交农三行结购的公债数额可以在财政部垫款押品项下拨结并搭配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垫款押品项下的结购公债一律按票面十足结购;结购公债的平均利率五厘;中交农三行享受准备金的利息等。<sup>②</sup>9月27日财政部核定转四行照办上项办法施行。统一发行问题,至此才告解决。1942年,中行缴交六成现金准备金共41.09亿元,是以交存央行白银款及国库垫款缴交的。其余四成保证准备金共27.39亿元,经财政部与四行商定,可用中交农三行各项垫款及现款,向财政部结购公债抵充。<sup>③</sup>截止1942年12月底,交行缴交六成现金准备金,共25.22亿元,其余四成尚在结算账目,准备移交。<sup>④</sup>

表1 1939—1945年四行及央行发行额

单位:法币百万元

时间	四行历年发行总额	央行发行额
1939	36909	13850
1940	72847	34072
1941	135261	60058
1942. 6. 30	136862	52921
1942. 7—12		175657
1943		632110
1944		1542937
1945		6123471

资料来源: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 - 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63 - 365.

由表1可见,四行发行额在1942年6月30日之前以40%—50%递增。而统一发钞权后,央行发行量逐年递增,1943年比1942年增加102%,1944年比1943年递增了144%,1945年比1944年再递增297%。

蒋介石高度评价统一发钞权一事为“此实金融事业最大成功也,亦为二十年来革命奋斗重要目标之一也”。<sup>⑤</sup>统一发钞权决策出台的过程显示了中交农三行与央行之间的利益较量和博弈,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首先政府迅速颁布法令,造成制度层面的既成事实,财政部、四联总处和四行之间再从细节进行商讨和博弈。这是一件凭借政治权力、利用金融手段,来扶植、加强和提高中央银行的职权和地位的典型案例和关键事件。在战局紧迫的背景下,出于金融实际管理和集中金融实

① 《统一发行实施办法》(1942年6月18日),四联总处秘书处编:《四联总处重要文献汇编》,第51—54页。

② 四联总处秘书处编:《四联总处重要文献汇编》,第49—50页。

③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第579页。

④ 《交通银行1942年度营业报告》(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539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感想与反省录”。

力的需要,蒋介石借助手中的集权,明令其他三家国有银行服从安排,交出发钞权,集中由央行发行。尽管中交农三行以曾给财政部巨额垫款和资金供应困难等理由,向央行和财政部要求优待办法,但央行除了在缴交发行准备金方式和资金供应的细则上有所妥协外,在期限和原则问题上态度强硬。在蒋介石的支持和推动下,四联总处和财政部主动抓住实施四行专业化的成熟时机,成功协助央行一鼓作气取得统一发钞权,提升了央行职权和地位,统制金融更为便利。

#### 四、四行专业化的成效及影响评析

特殊的抗战军事局势和金融变动交织,促成1942年前后中国金融困境的形成。随着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带来的军事转机、1941年7月英美封存资金带来的金融变动和1942年3月5亿美元援华合同带来的信心,蒋介石从金融界重要力量四大银行着手,推出四行专业化举措及统一发钞权于央行,再实施四联总处1942年改组来加强督导国家行局的业务,从根本上抓住国家银行命脉,以此应对金融困境。实际上,四行专业化的实施在投资运用、管理外汇、统制金融行政方面上确实收到了成效,但也存在问题。

在投资运用方面,国民政府借助西南地区四行金融网和四联总处,强调四行专业划分投资和放款经营范围,加大对农工矿业的投资力度,收到了一定的绩效。四行专业化后,交行业务着重于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1943年度交行放款总额为96070余万元,相当于同一年度存款额11.7亿元的82.08%,1944年度交行放款总额占存款额的比重更是达到96.39%。<sup>①</sup>交行的工业贷款发展迅速,在国家行局联合贴放贷款总额中所占比例,1937到1939年仅为4.72%,1940年即猛升至21.34%,到1943年,工业贷款第一次超过其他各类生产性贷款,而居各类贷款之首,占贷款总额的59.81%,1944年更升至72.15%。<sup>②</sup>农行专注于农贷和其他生产事业贷款,1944年度放款额占到了存款总额的60%,比1940年增加了3倍<sup>③</sup>,相较四行专业化之前大有改观。原先迄1941年底中行统计农贷余额为1.82亿元,占四行局农贷总余额的40.1%,与专办农贷的农行数字接近。<sup>④</sup>四行专业化后,中行的农贷业务也移交给农行。农贷区域由后方各省普及到战区、边区以及收复地区,注重农田水利及农业推广贷款,以增加粮食生产及战时所需各种特产为中心业务,逐步完成农业金融网。<sup>⑤</sup>国家资本在农工矿业经济建设上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然而囿于军事形势严峻、物资供应不足、物价节节攀升,贷款数额不敷其用,农工矿业厂商不断向四联总处要求加大贷款。例如农业方面,194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较1937年上涨20余倍,其中种苗上涨26.1倍,肥料上涨16.1倍,农具上涨21.7倍,设备上涨25.7倍,饲料上涨10.8倍<sup>⑥</sup>,农贷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另外,某些地区的四行支行私底下不愿意放贷投资生产建设,而是从事囤积黄金和外汇黑市买卖获得利润。贷款使用亦存在问题,1943年初,四联总处会同经济部及各行局派员组织调查团,对厂矿使用贷款情况实行调查,结果发现各工矿所贷款项,多有不投资于所经营的事业,而是购货囤积或

<sup>①</sup> 《交通银行1942年度营业报告》(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537—543页。

<sup>②</sup> 黄立人:《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代序)》,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27页。

<sup>③</sup> 《中国农民银行1944年度业务报告书》(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606—609页。

<sup>④</sup>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第582页。

<sup>⑤</sup> 姚公振:《中国农业金融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第304—305页。

<sup>⑥</sup> 陆仰洲、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转用他途,如“大昌矿冶公司借款拨存各商业行庄。中复兴业公司借款拨存商业银行,并投资与业务无关之商号,其进出口业务因香港、仰光沦陷,已告停顿。贵阳和丰裕实业公司借款未尽用于原定计划,现兼营贸易。……成都复兴实业社及互惠工厂借款存放比期,及投资其他行号”等。<sup>①</sup>再有,四行之间因受到利益纠葛甚至蒋宋孔人际关系的影响,并未按照规定顺从央行领导,有时需要蒋介石“手令”来解决问题,使得四行在投资运用上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说,实现专业化之后,四行在投资运用上的确实行了一些利于农工矿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些成效被抗战中后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弊端一并抵销,工业发展受阻并呈衰弱之势。

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掌控的财政部对外汇的管理权从一般外贸结汇与用汇申请审核,扩大到各国有银行的外汇存底。同时,孔祥熙任总裁的央行成为统筹外汇收付的唯一执行机关,使得政府在制度层面上加强了对战时外汇的掌控。华侨汇款是战时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实际上有效掌控了侨汇流向。1942年6月,财政部公布《统一四行外汇管理办法》,规定中中交农四行外汇业务由财政部集中管理,中交农三行外汇收付集中由央行转账调拨<sup>②</sup>,并且四行原有外汇资产负债,应规定期限报告财政部。有赖于多年来中行在境外外汇事业上的成熟,而且央行不宜在海内外遍设分支机构,央行委托中行管制战时外汇。央行从此不仅在本币资金上拥有最大的控制权,而且统制外汇作为调节货币数量与资金出入的手段,垄断性达到空前程度。因大后方英美现钞较多,黑市汇率与法定汇价比例越拉越大。1944年6月1美元合法币192元,12月为570元,1945年6月则为1705元。<sup>③</sup>继1944年3月底撤销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1945年4月15日行政院鉴于外汇审核事务减少,撤销外汇管理委员会,所有商业及个人申请购买外汇事项由财政部和央行接办。央行在制度层面上加强了对外汇的掌控,防止外汇外流。众所周知,衡量外汇实际管理成效的标志是弹性、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和多元化安全化的外汇储备。由于国际路线尚未畅通,进出口贸易及汇兑均无法开展,战时汇率价格不具备弹性和市场化的特点。外汇管理实际上仅在侨汇部分可圈可点。四行专业化后,所有侨汇由中央银行委托中国银行海外各地分支机构代理揽收。自南洋各地相继沦陷后,侨汇即集中于纽约、伦敦、澳洲三处。中行一面积极改善兑付手续,一面增设解款机构,推出举措有:办理电汇收款人登记、办理收款人印鉴登记、增设行处、利用邮汇局及广东省银行机构、委托商业行庄代解沦陷区汇款。<sup>④</sup>同时政府采取“贴补”的办法来吸引汇款。1943年4月,政府以法币50%“贴补”提供给外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售出的外汇。一个月后,该办法对“所有文化事业、宗教团体和慈善事业各组织”均有效。同年11月,“贴补”扩展到对侨汇及非官方外国人均有效。1944年1月起,“贴补”全部改为100%。<sup>⑤</sup>即1美金按照牌价规定兑付法币20元外,另加补助20元,共兑付法币40元。1942年中行所收侨汇数额竟达43100余万元法币。其中以纽约管理处经收33300余万元为最多,约占该行全年经收侨汇总额的76%。<sup>⑥</sup>1943年侨汇收入更有井喷式增长,比1942年增加3倍。<sup>⑦</sup>此

<sup>①</sup> 《秘书处关于调查厂矿使用贷款情况的报告》(1943年6月10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中,第368页。

<sup>②</sup> 《统一四行外汇管理办法》(1942年5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下,第172页。

<sup>③</sup>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pp. 382-383.

<sup>④</sup> 《秘书处关于中国银行年来办理侨汇情况的报告》(1943年11月25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下,第207-208页。

<sup>⑤</sup>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p. 155.

<sup>⑥</sup> 《秘书处关于中国银行1939至1942年经收侨汇情形的报告》(1943年3月1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下,第206页。

<sup>⑦</sup> 《中国银行1943年度业务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498页。

举有效地防止了侨汇流向“地下”,对维护战时金融稳定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统制金融行政方面,四行专业化决策出台后,一方面央行在四行中实力显著,利于调剂资金,更好地发挥管理金融市场的“银行之银行”职能;另一方面由四联总处加强对四行包括业务、财务在内的金融行政管理,达到了督导国家行局,统制金融行政目的。

表2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国有银行盈余表

单位:法币元

年度	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农民银行
1939	27774099	1944021	977543	2380000
1940	36781947	2301865	1096736	8000000
1941	72342625	2687551	1193029	6760000
1942	99058578	12988138	6365342	33190000
1943	390258735	24729061	22705505	119180000
1944	999000000		43968079	316290000

资料来源: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438页。1944年度央行数据为约数,分支行决算未齐。1944年度中行数据空缺,分支行决算未齐。

从表2可知,1942年后四大银行整体实力都得到显著增强,央行盈余始终大于中交农三行,优势逐渐显现。央行的实力大大增强,形成一个比以前更灵活的贴现市场,有效渗入其他银行和产业机构,利于调控金融市场,共同推进整个金融和经济活动。1942年9月,改组后的四联总处实践督导国家行局,包括划一人事制度、计政制度、银行实务制度和稽核通则等。如1943年1月,四联总处对于四行二局推行计政制度,向各行局派出会计人员,并由审计部派出审计人员,驻在各行局工作<sup>①</sup>,以便划一金融行政。在业务督导上,四联总处抽调各行局熟悉实务的人员,组成实务研究委员会,共同设计研究业务细则、格式、手续等,推进四行业务处理。<sup>②</sup>四联总处还颁布《暂行各行局稽核通则》来督导各行局的账务、财务及其他应行稽核事项。<sup>③</sup>国民政府管理金融市场、统制金融行政上加强了权限和作用,成功地进行了制度调整。

但是,国民政府最注重的通货发行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1942年统一发钞权后,央行法币发行额均超过存款额1倍或近1倍。<sup>④</sup>当局所发钞票量有增无减,物价上涨趋势越来越猛,百姓不愿意把现金存入银行,选择持币待购。尽管各家银行在四联总处的督促下,发动各种形式的储蓄存款活动如美金储蓄、黄金储蓄、有奖储蓄等,一再吸收游资,但随着战事逐步推进,财政消耗过大,通货膨胀陷入了恶性循环。

原先国民政府想借助美国5亿美元贷款来回笼法币,紧缩通货,平抑物价,促进经济建设。1942年2月,国民政府发言人对外宣称表示美国贷款会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日本给中国施加的经济压力。<sup>⑤</sup>蒋

<sup>①</sup> 《秘书处关于指派会计与审计人员前往官立银行工作的报告》(1943年1月7日),《四联总处关于各行局计政制度之推行事宜的报告》(1943年),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704、711页。

<sup>②</sup> 《各行局实务研究委员会工作纲要》(1944年2月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712页。

<sup>③</sup>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为四联总处颁发暂行各行局稽核通则应洽照办理函》(1944年4月1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719页。

<sup>④</sup> 洪葭管:《中国金融通史》第4卷,第466页。

<sup>⑤</sup> Chungking, February 3, 1942, National Archives II of USA, Maryland, RG56, Entry66A816, Box68, Folder China Loan (MYM500 Million) January 1942.

介石甚至表示“美国已允我借用二万万美金之数,来调剂我金融与经济,此为抗战转危为安一大事,如运用有方,则建国基础亦因此得以建立矣”。<sup>①</sup> 此处2亿美金是5亿美元中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和美金公债的专款。实际上,5亿美元贷款使用过程中显现出的人事沟通拖沓和监督不足,使得控制通货的成效不大。早在1942年4月,孔祥熙致电宋子文,二者均主张利用5亿美元贷款办美金储蓄,而且此事财政部与四行早有计议。<sup>②</sup> 直到次年6月,蒋介石才与孔“协商对美汇运现金吸收法币问题”。<sup>③</sup> 8月,蒋介石再与孔祥熙考量“美金运用方法”。<sup>④</sup> 1943年11月,蒋介石还在研究美金运用方案,突发感悟孔祥熙“对财政金融计划之老练与精明,实非他人所能及也”。<sup>⑤</sup> 最终,美援款项的不同用途及其获得日期分别如下:发行美金储蓄券、美金公债2亿美元专款(1942年4月15日),购买黄金2.2亿元(1943年2月1日2000万元;1944年10月13日2000万元;1945年5月22日6000万元;1945年6月12日6000万元;1945年7月27日6000万元),购买美墨布匹2500万元(1945年7月18日1000万元;1946年2月7日150万元;1946年3月13日1350万元),购买印钞器材2000万元(1943年3月2日),其余为印钞费用、手续费及运保费3500万元(1945年8月3日)。<sup>⑥</sup> 款项获得时间从1942年4月持续到战后1946年3月,将近四年之久。而且大笔资金集中在抗战后期拨到中方账户。中方获得款项之后,未能及时投入使用。整个5亿美元贷款的后续工作,耗费时间在商量美援用途方案、在华美军垫款结算、购买黄金运华谈判<sup>⑦</sup>等相关事宜交涉。在交涉过程中,美方不断质疑中方使用贷款的方式、蒋孔宋决策美援用途的过程拖沓。待到最后美方多批款项拨到中国账户时,业已错失了1942年出台四行专业化决策、统一发钞权、一鼓作气紧缩通货的最佳时机,其对缓解金融困境的实际功用不如预期。

更出人意料的是,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部长和央行总裁,操纵贷款使用权,爆出了震惊大后方甚至引起美国朝野愤懑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使国民政府的腐败暴露无遗。1943年10月15日,央行业务局局长郭景琨受孔祥熙的指示宣布美金公债售罄。实际上,各分行尚存数千万美金债票。<sup>⑧</sup> 这些未售美金债券并未上缴国库,相当部分被掌管国家财政金融的官员私下瓜分。蒋介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调查此案。调查结果是美金公债停售后,所剩约5000万美元被央行职员、国库局职员和权贵私分,其中包括宋美龄、宋霭龄、宋子文、陈光甫、魏道明等人。<sup>⑨</sup> 孔祥熙是私分最大的获利者。蒋介石在1944年11月免去孔祥熙的财政部部长职位,抱怨“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sup>⑩</sup> 有学者认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黄金舞弊案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它说明此刻大后方腐败的蔓延和权势的侵蚀已成为国民政府内的普遍现象。<sup>⑪</sup> 摩根索在1945年5月给宋子文的备忘录中提及5亿美元作为法币保证金来控制通货本是件正确的选择<sup>⑫</sup>,2亿美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7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 《孔祥熙致宋子文电》(1942年4月8日),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552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15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8月10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11月20日。

⑥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 - 1949, Based on the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 470;《一九四二中美五亿元借款用途说明》,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575页。

⑦ 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第79页。

⑧ 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第560页。

⑨ *Morgenthau Diary (China)*, Volume 2,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 p. 1488.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7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

⑪ 郑会欣:《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发生及处理经过》,《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22页。

⑫ *Morgenthau Diary (China)*, Volume 2, p. 1533.

元美金储蓄券与公债以及在中国销售的黄金落入了极少数人的手中,对中国经济的真正帮助失败了。<sup>①</sup> 1944年2月“法币膨胀,物价飞涨,无法遏制”,蒋介石感到“忧戚无已”。<sup>②</sup>

总之,国民政府四行专业化决策的实施对于应对战时金融困境的实际成效不一。一方面,在投资运用、管理外汇、统制金融行政方面上确实收到了成绩,另一方面在控制通货方面效果差强人意。因种种原因5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在挽救财政金融上错失良机。

综上所述,军事与金融因素交织促成了1942年前后四行格局下的战时金融困境的形成。困境表现在控制通货、运用投资、管制外汇和统制金融行政等多方面。基于应对困境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国民政府推出了近代金融史上的重大决策四行专业化。其中关键性政策统一发钞权的实施过程体现了中交农三行与央行之间长久的较量和利益博弈。而后国民政府通过四联总处改组督导四行,将中中交农四行为首要的金融界控制于股掌之中。国民政府实行四行专业化的直接目的是完善银行制度,增强四行实力。其实质目的是加强统制金融,服务抗战。可以说,1942年四行专业化决策对于应对战时金融困境,在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调整是成功的。明确四行业务范围、统制金融行政、加强管理金融市场、央行统筹外汇等举措在建设金融制度层面上有着重大意义。确立了中央银行统筹为主、中交农三行注重业务的分工模式,提升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权,加强了对战时金融监管。特别是统一发钞权制度的确立,确保由央行一家调控货币供应量。央行的“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基本职能和性质更为显现,为战时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另外,四行专业化后,借助四联总处的协调,四行在农工矿业建设投资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央行统筹收付外汇政策对防止外汇外流和掌控侨汇流向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央行实力得到增强,便于管理金融市场,并由四联总处加强对四行金融行政管理,维持战时金融正常运转。但是,囿于国民政府本身在金融财政领域的人事沟通不畅和监督制度上的不足,以及中美双方谈判旷日持久,遗憾地错失了以5亿美元援助来控制通货、应对财政金融困境的最好时机。

自民国建立以来,轮番上台的各届政府都试图掌控金融,但都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实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和国内金融的变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依据1942年相关金融和军事形势,因时制宜,一步步主动筹划银行业务专业化和统一发钞权,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及银行专业化体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国民政府实施这一重大决策,调控四行金融力量来应对战时金融困局,对抗战胜利帮助甚大。其中蒋介石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蒋介石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等要职于一身,作为战时政治、军事、金融的最高决策者,全局考虑国际国内形势,熟练运用政治体制,调动财政部、四联总处和中央银行及其他部门相关人员共同推出1942年专业化决策,意图一一针对解决战时金融困境的多方面难题。同时,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争取而来的5亿美元贷款,承载了蒋介石试图依靠美援来摆脱财政金融困境的谋划,遗憾的是最终成效不甚理想。毋庸置疑,蒋介石处理金融问题时所表现的主动性,既是出于自身所处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也是为了巩固其在金融、政治、军事方面的掌控力,更是为了取得抗战军事胜利和维护国民政府的利益。

[作者尤云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sup>①</sup> *Morgenthau Diary (China)*, Volume 2, p. 1542.

<sup>②</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2月26日,“本星期预定”。